

“趣”与中国美育

黎 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趣”作为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趣的含义向心理趋向意义发展,展开了其在美学上的内涵。趣在审美发生上出乎情性与自然,表现出了浓厚的生命意识;主体在与客体圆融统一的境界中进行审美体验,从直感与思智两方面都获得心灵的愉悦;人格精神与艺术作品浑然同体,相济相生,于艺术中确立审美品格。这些都是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负载着美育的深沉使命感。近代梁启超等人将趣的美学精神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融合道德与艺术,塑造了理想人生的审美境界。

关键词:趣; 审美体验; 美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4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2-0012-07

在当代美学中,“趣味”或者趣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不经意的嗜好、兴趣等无功利的方式,将深层的人性本体呈现出来,它是些许日常工作小事,且个体性极强,因人而异,容易被人所忽视,然而它却是人性积渐入微、潜移默化的催化剂,在审美与文艺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因而中国古代圣贤素来重视它的养成与引导,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童子雕琢,必先雅制”,莫不说明“趣”的重要性,而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倡导“趣味”说突破的。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趣”自先秦开始便出现了带有心理趋向性特征的意蕴,后逐渐进入到审美领域中。及至南北朝时期首次出现“趣味”合用,以表现对自然的审美感受。但由于汉语音节的特点,“趣”仍然作为一个美学的重要范畴被使用。“趣味”一词,趣与味所体验到的审美愉悦是相近的,因此二者合一,而含义与趣略同[1](P295)。

美的教育在当今社会是一个重要话题。朱光潜曾在《谈美感教育》中指出:“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2](P144)因为自然、艺术与人生充满兴趣,才提供给美以可能。趣出乎情性,蕴含着勃勃的生机活力,彰显着生命之美。在趣的审美体验中,主体与客体圆融,从感官感受和智性妙悟上都能体验到愉悦,这种愉悦支持人们进一步探索艺术,使用艺术的形式将自然原始的趣归结

在纯粹的美的境界之内,同时借此提升了艺术自身的魅力。而谈文论艺之后,趣突破了艺术手段的局限而落实到人生之中,负载着美育的使命。趣在每一时代的美学风尚中呈现出动态多元的特征,引导人们进行自然、艺术与人生的审美体验,其美育价值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本文以“趣”范畴为主,剖析其在中国审美思想中的特点,及其与趣味的现代审美意义的关联,讨论其对中国当代美育精神的影响。

一、“趣”的美学意蕴

在先秦文献中,趣始用于疾、趋二义,语出《诗经》《周礼》。《说文解字》曰:“趣,疾也。从走取声。”段玉裁注引《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趣马”句,又引《周礼·夏官·趣马》中“趣马”一职,意为督促养马之人。段玉裁随后指出,后来归趣、旨趣的意义即是引申义[3](P63)。《诗经》中还有趋向之义,如《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周王郊祭天神,恭谨在前,左右大臣疾趋在后。又有《周易》“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与当时的形势环境等相趋而动。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地》中出现了以“趣舍”表示心理趋向,将趋向义引申至精神领域。其中首先列举了两种失性的例子,一例是百年的树木被做成酒器,使用的部分用青黄彩色来修饰,而砍断不用的部分则被丢弃在沟中,二者在美丑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就丧失其作为树木的本性上而言是一样的。另一例是夏桀、盗跖和曾参、史鱼两类人,其行为好坏是有差别的,而他们同样

收稿日期:2018-01-21

作者简介:黎臻(1988-),女,重庆石柱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两晋文士族群源流与文学风格研究”(项目编号:17YJC751014)。

都是丧失本性的。其后说道“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悞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成玄英疏曰“趣,取也。滑,乱也。顺心则取,违情则舍,扰乱其心,使自然之性驰竞不息,轻浮躁动,故曰飞扬。”[4](P458)色、声、臭、味是人的感官感受,心为奥府,人们或顺心,或违情,精神上的趋向或放弃,会使心性远离自然而轻浮躁动。这里的“趣”已初步具备了心理趋向的意义,在心理趋向特征上,它可以视为“趣”之美学意义上的萌芽。心的欲望与声色嗅味等感官一样,是伐性之斧,因此庄子要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4](P290),即从感官和精神上都达到“忘”,才能够抵御外界的迷惑,寻求到真知。后来刘安《淮南子·精神训》中本于庄子此番言论,将五色、五声、五味和趣舍视为四种牵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聒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5](P514)心是五官的主宰,也是知觉、意识的本源,在儒家思想中,心包含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认知、情感,也是感物而有知的“天君”。而道教则要以虚静之心玄览万物。《淮南子》以趣舍作为影响心理的嗜欲,在感官与心理感觉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认识与情感的趋向,是“趣舍”精神意义的发展。

在《庄子·天地》和《淮南子·精神训》中,趣舍都被视为与色、声、味等一样影响本性的因素,但趣相较于其他更具有精神意义和心理趋向性。《庄子·秋水》中又特别以“趣”作为六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之一,说道:“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4](P578)刘文典《庄子补正》中认为“趣操”是“趣捨(舍)”之误。结合《天地》中“趣舍滑心”的说法来看,趣的这种心理趋向性直接指向无为与有欲带来的是非问题。尧无为无欲,桀有为有欲,而皆自以为是而相互菲薄。庄子认为,以取向的角度来看,万物自是而相非,而若以道统而观之,则万物无分是非、对错与贵贱。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乐天知命、安贫乐道是中国圣贤的古训,由此决定中国美学的生命意识是世俗化的,追求日常生活的感官享受与世俗趣味,浸淫到审美趣味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国美育精神的构建,离不开这种世俗生命意识的影响。

“趣”的精神意义引发了六朝时期意志、旨趣上的取舍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个性得以突显,情感

逐渐摆脱道德束缚而趋于美的存在,对山水的审美态度也愈加纯粹,人物和山水的趣味品评成为当时士人审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人物与自然的品藻之中,“趣”被大量运用于品评语之中,以表现这种转变。士人认识到除美刺与事义之外,还有趣味。后来唐人在谈论六朝人物时,也特别欣赏这一时期士人的趣味,如房玄龄在《晋书》中评向秀“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向秀传》)[6](P1374),评嵇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高远”(《嵇康传》)[6](P1374),评列女刘娥“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列女传》)[6](P2519)。

东晋时,士族名士更是将“趣”作为人生与审美融为一体的生命体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有“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6](P2099)王羲之在这篇名文与书法作品之感喟,人生之旨趣各不相同,而对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悲叹确是在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中常有的。他们努力寻求自我精神的慰藉与超脱,以及超脱之后的快然自足。然而却不可避免要面对世事变迁、老之将至,于是将人生短促的感慨寄托于山水之间,既执着于当下,又超离于当下,在瞬间的感受快乐中体验永恒的生命价值,将宇宙精神与人生感兴融为一体,创作出来千古卓绝的《兰亭集序》,彰显出其高雅的人生趣味。这种善于在瞬间世俗乐趣中品味、捕捉永恒的生命精神,在后来的苏轼生命哲学与美学中,获得升华。在《世说新语》这部号称魏晋“名士的风流宝鉴”中,也多次出现“趣舍”一词,如(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7](P206),“成都王长史卢志,与(陆)机弟(陆)云趣舍不同”[7](P897)。在士人对人生旨趣的选择上,不同的方向也决定了各自的审美趣味和精神人格。在感官直觉的有迹之形基础上,这种经验的把握使得趣从疾、趋之义向精神世界作持续思考和主观性的理解,从而使其包含了独特的精神意蕴。因而,在对趣的深刻理解之下,汉魏时人便得以深入玩味其中奥妙,并以趣观照到人的个性本质。

而“趣味”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趣”与“味”在审美体验上的相似性。“味”是人们由品尝食物而形成的一种感官感受,味觉是人们感知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方式之一。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味”是一个意蕴非常深厚、发展甚为成熟的审美范畴。“趣”与“味”作为审美体验常会并列出现,并表现出意义上的互文性。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8](P506),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以论诗”等[9](P20)。“趣味”作为一个审美词语,最早出现在酈道元《水经注·江水》中,酈道元形容长江三峡自然

景致“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10](P790)自然山水的欣赏即是对其内在趣味的品赏,这种趣味本身具有能被人感知的审美属性。在趣的审美意蕴逐渐明晰之后,它在各个时代中表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特征,从审美发生、审美体验、审美品格等多方面显示出其所承载的传统美育精神。

二、“趣”与生命活力的彰显

中国美育精神负载着浓厚的生命意识。美育精神首先表达为对生命力的要求,生生不息的活力是美产生的源泉,也是美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中的“趣”是一种审美质性,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它生发于主体的性情与心灵,充满了生气,能够让欣赏者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吸收支持生命、发展生命的活力。从心性 with 趣味双重互渗的结构去解析中国美育形态,是一个重要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个性与人生逐渐受到关注,审美的对象开始转向人的自然情性,因而析出了以情趣、志趣来评人,这些评语也直指精神趋向。如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评刘陶“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11](P1842)同志、同好尚、同情趣,即是道德意义上的趋向相同。《晋书》中又有石崇“与(裴)楷志趣各异”[6](P1048),司马宗“与王导、庾亮志趣不同,连结轻侠,以为腹心”[6](P1595),个人的志趣可以是道德上的,亦或是审美上的,在趣味的异同上区别敌友,是人在自然本性上的趋利避害。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八《孔稚珪传》有:“(孔稚珪)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随后以二人的生活情趣来解释“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机独酌,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12](P840)其相得之趣,是从山水、草莱、蛙鸣中获得的,通过外在的感官感受而触动人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生活中的趣味。趣的审美体验本于人的自然情性,而内在形成一种愉悦。

这种精神意义还进入到经典文本中,在汉代多表现为对经典意旨的发掘与品赏。汉代《孝经序》中言“会五经之指趣”,王逸《楚辞章句序》中言“大指之趣略可见矣”,王充《论衡·案书》言“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13](P1175)。除经典之外,魏晋时期的指趣(旨趣)一词也常用来欣赏音乐,如嵇康《琴赋序》称“览其旨趣”等。

自宋以后,文士借由诗文的创作与评论进一步阐释了趣在审美意义上的“生”的发展趋向,强调人的性灵与生机,强调内在的元气与活力,贯穿着蓬勃的生命力。首先,趣是人的性灵的体现。“趣者,生气与灵机也。”(史震林《华阳散稿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袁枚《随园诗话》引杨万里语)[9](P2)先天禀

赋是趣的基础,有天分,方能有风趣,如果没有天分,则只能空描格调。其次,趣是人的生命力的源头。明人钟惺在《东坡文选序》说道“夫文之于趣,无之而乏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也。能知觉运动以生,而为圣贤、为豪杰者,非尽趣所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14](P204)将趣与“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趣表现为元神活泼。陶明浚《说诗杂记》卷七疏解严羽之兴趣时说“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15](P608)兴趣必须是鲜活生动的,是人的精神的体现。明人江盈科则以元神活泼作为趣的内在意蕴“元神活泼,则抒为文章,激为气节,贤为勋猷,无之非是”,然后“其衷洒然,其趣怡然”(《白苏斋册子引》)[16](P292)元神活泼,便是主体的内在性灵的向外流露,因此自由真率。“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14](P121)正是由于此种率真,使得性灵毕现,因而生出趣味。不压抑真性,不遮蔽真趣,才能在诗文创作中展现出人生情致。

趣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之美延续至近代,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美术与生活》中说“趣是生命能量的富有,是生活的朝气与灵机。”[17](P4017)他的趣味主义提倡的是“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意育要教到人不悞”“情育要教到人不忧”。其中的情育即是从一个侧面谈到的美感教育。这种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即是“仁者不忧”。仁者不忧,是建立在生命活力基础之上的,孔子从生活、自然中获得最真的生命体验,即是自得于己。有了自得之趣,在对己、对人、对自然中生出“坦荡荡的胸怀,活泼泼的精力”[17](P3990),他将趣味的原始的生命活力上升到了轩昂奋发的生命意志和人生情态,并进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心灵状态。因此,梁启超认为,孔子是生活在趣味境界中的一位仁者,“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为学与做人》)[17](P4065)。承续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朱光潜提出“情趣”论,也十分注重情趣美中的生机与活力。情趣本于生命,自然也蕴含有生命的特质。生命的活力以及人基于生命活力而来的创造,都向我们展示着人生趣味化的特点。“情趣本来是无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2](P91)他崇尚活动与创造,不止要静的欣赏,还要动的创化,二者和谐统一,才是实现美的最高境界。而趣味也需要静的欣赏和动的创化“趣味对于生命的澈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进展和创化。”(朱光潜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2](P352)趣味生于对生机的感受,顺从自然生机而发展创造,从创造中享受快乐,即是感受到趣味。

趣从早期的心理趋向意义开始,从奥府生出活泼的力量向外流露,奠定了其生机与活力的基础。在向内的发现和向外的探索中,人们加深了对趣味的认识,并加以加强对美的体悟,催发了美的诞生,促进生命进入美的境界。

三、“趣”与主客圆融的体验

中国文化中倡导人与宇宙自然合一,穷神尽性,最后达到最极致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传统精神的表达,也是美育精神的基本特征。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都需极尽圆融,浑然一体,方能求得趣的体验。

趣味的获得,除本于人自身情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对象便是山水自然。自魏晋南北朝士人发现自然之美,并将人物美与之相结合之后,山水自然之趣作为审美属性进入人的审美活动之中,欣赏者与自然两相圆融,从而获得自然之趣的审美体验。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审美体验。简文帝游览华林园时,产生“会心”之感,在明山秀水间兴发了庄子濠濮优游的感受,静因山水,动因鸟鱼,万有自生趣味,与人相亲。自然之趣与心中之意相会,即是主客圆融的审美体验。因此乃有顾长康“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7](P143)的画意描述,有王羲之“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18](P896)的忘我境界。

士人对于自然之趣的审美体验,需要敏锐的感官感受,也需要主客体之间的印契。英国哈奇生认为审美的感觉是天赋的,取决于“内在感官”,即人的心灵。梁启超指出趣味需要一定的外在刺激和机缘诱发,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感觉器官敏则趣味增,感觉器官钝则趣味减;诱发机缘多则趣味强,诱发机缘少则趣味弱”(《美术与生活》)[17](P4017)。在趣味的体验中,主体要保持相当的敏锐与灵慧,客体需提供能刺激感兴的机缘。元人诗评《诗家一指》之“十科”中论及“趣”时即述此意:“意之所不尽而有余者之谓趣。是犹听钟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眴然真用,将与造化者周流,此其趣也。”[19](P278)这里将“趣”与中国传统审美范畴“兴”联系起来。钟嵘的《诗品》有“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家一指》则将意之所不尽而有余者称之为趣,所兴者,即是趣。清人乔亿《剑溪说诗》中也谈到此种关系:“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20](P1098)触物其兴,便是听钟声、乘月游时被外界机缘触发而得到的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使得主体进入了与大化之道一

同周遍流行的境界,超出万有本身,也超越了主体主观意志之外,是“有余者”。

这样的审美体验便表现出两种路向,一是侧重于对外在对象直感的感性的愉悦,就趣味而言即如山林之趣、天趣、真趣等;二是强调主体心境与思智的智性的愉悦,如理趣、志趣、情趣等。

山水自然中的野趣、山林之趣作为欣赏者吟咏的对象,以其直接的感官感受为主,如“梅边松下,弄月吟风,时卷舒之,亦足以发其幽趣”(蔡正孙《诗林广记序》)[21](P9565)。面对可供品赏的风物,审美主体精神被触发,在卷舒之间趣味自得。同样,明人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中也有“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14](P121)主体与客体的印契,是“色”“味”“光”“态”与“心”的相会。在对自然的品味中,诗歌作品将这种趣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读者对诗的审美观照中被重新获取。宋人韦居安评叶靖逸《西湖秋晚》诗“爱山不买城中地,畏客长撑屋后船。荷叶无多秋事晚,又同鸥鹭过残年”之野趣,评范仲淹《寄林处士》诗“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金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寸出山来”之山林真趣[20](P565),正是自然之趣的艺术化欣赏。

另一方面,自然之趣的获得也有赖于主体的学养与气局。袁宏道在为《癖嗜录》作序时说道:“谈艺家所争重者……不出兼情与法以为的。予独谓不如并情与法而化之于趣也。非趣能化情与法,必情与法化而趣始生也。岂止此也,即神识玄旨亦必尽化而趣始生也。”[22](P60)艺术作品中的趣,兼具情感与法度,即是创作主体情感弥漫而规范在艺术规则之内,其中之趣始能生发。而这所生之趣又“无所倚”,主体进入趣味境界,便达到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的无所依傍、姿态横生的状态。那么体悟趣味,则需要相当的本领、学问、心思与气局,山林之趣味,虽不可从学问中得,却需以学问为基底。

另就主体的心境与思智而言,得趣的过程是一次灵慧的妙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即以“趣”言书之要妙。士人王济曾拜访叔父王湛,两人共谈《周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邓粲《晋纪》)[7](P429)。以趣之高奇,来说明《易》之玄邈,不仅是对《易》本身的评语,更是对谈易之人物风度的品赏,此种妙言奇趣是主体在清谈之中寻求到的精神满足。宋元诗家在对陶渊明诗歌的鉴赏中,也常常以理趣来表达此种智性的愉悦。宋人袁燮有“而陶靖节为最,不烦雕琢,理趣深长。”(《题魏丞相诗》)[23](P416)李涂评“《选》诗惟陶渊明……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天成,无斧凿痕。”

(《文章精义》)[24](P849)惠洪亦称陶渊明《田家》诗:“脱去翰墨痕迹,读之令人想见其处,此谓之奇趣也。”[22](P10238)陶渊明的诗歌出于自然,而其中之理趣深长玄远,但诗文中却毫无斧凿痕迹,浑然天成。元好问称之为“自得之趣”,无一定人生境界与学力者不能得。而后世文人从中析出“理趣”,也是欣赏主体个人的学力、修养所成就的。

由于这种智性的愉悦,趣味获得的审美心境与禅境类似。自然中的山川草木,风烟云月皆是主体视听感官可以感知的,而将其入诗,则在山川之外,更有一超越的境界。趣味即从此境界中获得。宋人戴复古将诗趣的获得与参禅联系起来说:“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25](P167)主客体统一的审美体验中,艺术的趣味源于自然之生机,也有赖于主体的思智妙悟。在对自然直观感受的基础之上,生发思智深远、浑然天成的智性的愉悦,便是这种体验的过程,如袁中道所指出的“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15](P746)。趣味的妙悟提供了近现代美学精神中的修养问题的思想基础,学者们也多提倡修养在趣味中的作用。朱光潜《谈静》一文称“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也由于修养。”[2](P15)趣味自得因于天才,妙悟依靠修养,在趣味的体验过程中,以外在环境为机缘诱发,主体本心之灵慧流露而出,注重禀于自然情性的天赋,亦重视个人后天的学养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是美育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四、“趣”与人格精神的养成

唐君毅《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中说“中国人之最高人格理想,正是人格在艺术品中之表现。”[26]趣正是处在士人的理想人格与艺术表现的交汇点上,它生发于人的自然情性,是人的灵慧之性的表现。而这种最自然的原初的冲动需经过审美化、艺术化的过程而表达出来。自然为趣味提供了富有生机活力的诱导,而个人则以其精神人格为世人所欣赏,将趣味提高到更为高尚纯粹的境界中去。人们的这种审美判断与能力,依靠文学、音乐和美术等更加活跃地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种艺术的魅力,最后升华为人格精神与人格境界,从浅层的感性趣味出发,臻于高尚的人格精神,自然也就与美育的终极目标相契合,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是在这一点上,趣味将中国哲学的心性哲学导向了人格审美境界,构成其中的桥梁。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个性得以突显,情感逐渐摆脱道德束缚而趋于美的存在,对山水的审美态度也愈加纯粹,人物和山水的趣味品评成为当时士人审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人物与自然的品藻之中,“趣”被

大量运用于品评语之中,以表现这种转变。士人认识到除美刺与事义之外,还有趣味。后来唐人在谈论六朝人物时,也特别注重评断士人的趣味,如房玄龄在《晋书》中评向秀“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向秀传》[6](P1374),评嵇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高远”(《嵇康传》[6](P1374),评列女刘娥“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列女传》[6](P2519)

“趣”中所蕴含的人格精神及其与自然的圆融与契合被艺术化、审美化之后,展现在文学、绘画、书法等各个领域之中。在魏晋时期盛行的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下,艺术创作与批评中都充满人物的精神风韵与魅力。书法的线条之美与流动之势,便常常以人物风神来比较与品题。《世说新语》中评王羲之其人“飘若游龙,矫若惊龙”,而《晋书》中则见用此语来品目他的书法作品,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已融入了个人风度神韵而展现出相似的魅力。在南朝书法批评中,也出现了许多以人物风神来品评书法风格的审美趣尚。袁昂《古今书评》评王羲之的书法“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27](P46)。陈郡谢氏与琅琊王氏均为魏晋大族,个人风度超越常人,英朗俊迈,精神渊深,自有一种风气。袁昂以此来评王羲之的书法,言其虽结体或有不端正者,但是整字的风韵仍存,有名士风范。这种将人物精神风趣与书法之趣相结合的品评,既将精神风度艺术化,也提升了艺术作品的审美品格。

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性对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便谈及作家之气对文章风格的对应关系。在趣味的表现上,评论者也常常以士人之优雅风度来品评诗文。受到唐人以趣评人的风气的影响,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大量以“趣”特别是“兴趣”来品评诗人,有“兴趣高远”“兴趣超然”“志趣高疏”,而其诗“兴趣飘逸多感”等[28]。明人许学夷则在其《诗源辨体》中特以“兴趣”品评唐诗。他着重以“兴趣”作为盛唐时期诗歌的特点,阐说盛唐诗歌“体多浑圆,语多活泼”“形迹俱融,风神超迈”“冲融浑涵”等[29](P6168)。对唐人之兴趣与唐诗之兴趣的品论,可以见出主体趣味对艺术趣味的影响,而此间的两相对应也为后世品评诗歌打开了一种范式。

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多次以“趣”论文。刘勰将“趣”的不同字义广泛地运用到评论中,有取舍之意、旨趣之意、趋向之意,又有情趣之意。而这些“趣”的评判,也反映出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前代文学趣味的判断。《体性》篇云“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8](P505)在刘勰看来,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之间是“表里必符”的关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本篇的

主旨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说的“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之文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刘勰把作品的风格概括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又进一步将它们归纳为两两相对的四组,即“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认为“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除完全对立的两类之外,每一种风格实际上都可以与其他风格相兼,组合成新的类型。不过,刘勰对于这八体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他最看重的是“典雅”一体,这和他“宗经”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他强调“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指出先学习雅正的作品,这是八体中最根本的,可见他对“典雅”的重视。与此相反,刘勰对八体中的“新奇”和“轻靡”是有所批评的,“新奇者,摭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他在《定势》篇中曾批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在《序志》篇中感叹“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两相对照,从用词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褒贬。范文澜先生也指出:“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文心雕龙注》)刘勰《文心雕龙》将作者内在的心性与外在的风趣刚柔等风格特点相结合,倡导典雅、雅正、雅制等高雅的情趣,促进人格精神的养成,这对于纠正南朝的绮靡文风,起到了正本清源之作用。

历代对人物精神的鉴赏与艺术欣赏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们从自身出发来观照世界,在美的领域中获得相似的感受。意欲从艺术作品中寻得理想的精神人格,又意欲将人的生命看做艺术化的存在,以“趣”的角度,来处理个人在万有之中的位置,认识个人与万有的关系。因此,人的趣味充满了美感,自然与艺术的趣味则获得了境界的提升。诗人的才情与趣味抒发于诗文作品中,以优游不迫的趣味,来确立士人的理想人格之所在。直至晚清,康有为从儒家心性修治法的审美维度开出他的“趣”,将“趣”的范畴以道德的角度回归到生活。因此趣在道德与艺术两大支柱中落脚,用以指导人生。康有为强调“主静出倪”,静养以去除私利物欲,而在道德心的静养之间有一种渐进而愉悦的感受,即是一种闲适自由的趣味。康有为称“学者既能慎独,则清虚中平,德性渐融,但苦强制力索之功,无优游泮泮之趣。”[30](P343)

从“主静出倪”沿袭而下,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首次提出趣味主义,将人生与艺术结合起来,强调趣味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日常劳作与工作中。他

在文章中多次谈到,人生是以趣味为根柢,趣味是活动的源泉,是生活的源动力。他将趣味的对象推展到了“活动的对境”,趣味的审美瞬间弥漫至整个人生活动中,是一种持久的、有内涵的人生觉解和动态实践,美的超越性在这里与人生的现实行为统一起来。趣味的载体如劳作、学问、教育、艺术与自然等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将普通的生活随时随地感受成为一种人生佳趣,是一种审美性的行为和体验,也是必须的生存方式。他提倡趣味是超越的,又是入世的,只有将审美超越与现实活动统一起来,才能获得本心最大的自由。

梁启超将责任心与兴味并举,将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统一起来,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化,将人生指向了与道德暗合的美的自由的理想人生境界。他提倡出于本心的自由劳作,主体不是因为劳作有趣才为之,而是对劳作之事感兴趣,以自由愉快的心态去劳作,趣味自然显现出来。除此之外,学问、教育、艺术等皆如此。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甚或辛苦劳顿中也要随处俯拾人生之佳趣。就如《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祖约与阮孚的故事。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屐,有人去拜访祖约,见他正在查看自己的财务,客人到了以后,没来得及收拾完,便将剩下的两个小竹箱藏在身后,神情中略有不妥。而有人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吹火为心爱的木屐打蜡,阮孚一幅闲适舒畅的神色,兀自感叹道“还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呢!”在天地永恒、人生无常的大背景之下,阮孚一方面对当下人生进行感叹,对生命的短暂惋惜,同时又将这种痛苦转移到木屐之上,完成精神的超越和理想人格的构建。二者高下即判。

而人生中,文艺的趣味是引导其走向高尚境界的途径之一。梁启超认为“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17]。王国维也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指出,文学、美术是高尚之嗜好。个人的修养会影响趣味的趋向性,与其精神嗜好密切相关。嗜好首先是本于人心的活动,因嗜好而引起精神上的趣尚,这在《庄子》中也已经谈到过,所谓“趣舍滑心”。因为人心的活动需要得到满足,或满足食色之欲,或满足精神之游戏。惠洪便曾多次谈到嗜好与诗歌艺术的联系。他在《冷斋夜话》中提到三位品诗之人[21](P2341),以一己之嗜好诵诗,从而获得了其中之趣味,达到精神胜境。一是欧阳修“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孔融性宽容少忌,喜好携导后进之士,为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有“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之叹。欧阳修有此同好,便常诵咏孔融之语,语中精神同契。二是范仲淹“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三是苏轼“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

‘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因为有相同的精神喜好,而能于诗文中与创作主体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达到意趣契合的愉悦。梁启超在《美术与生活》中概括趣味之源泉,其中之一便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惠洪所谈之嗜好,便是梁启超所言。梁启超说“因为个人的心都有个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痒处,便把这微妙之门打开了。”[17](P4018)情感被别人指点出来,快乐的程度会增加,苦痛的程度会减少。这种趣味的引契,会引起精神的愉悦。袁宏道称其为“天地间至妙至妙者”。袁宏道在为《癖嗜录叙》中便指出,此书的作者颠生对于文之趣的嗜好:“颠生于世,无所嗜而独嗜乎文,于文无所不嗜而尤嗜乎文之趣。”[22](P60)颠生的嗜好是文章,而文章中又尤其嗜好文之趣。文之趣表现于文,是不可捉摸而又姿态横生的,让人达到不行不止、无所倚靠的精神状态,沉醉于此精神胜境以至成痴。文艺

的嗜好,得以满足人类普遍的感情。“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31](P122)王国维揭示了此种快感之中的不可遏止的“势力”,需从文学美术中求得。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艺术与人生,既有对现实的觉解和对功利的超越,也表现为从艺术返观生活,对生活的迷恋与全身心投入。趣味所表现出来的活泼的生命力、灵慧的妙悟,在艺术创造中赋予其丰富的魅力,在生活中亦彰显其超越的价值。趣是生活化和艺术化的结合,是人们在追求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之路上的基本途径,它的活泼的生命力、内外融合无间的境界,对中国当代美育精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成复旺.中国美学范畴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2]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5]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9]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0]酈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3]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5]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16]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
- [17]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1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9]张健.元代诗法校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0]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1]吴文治.宋诗话全编[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2]宋致新.独抒性灵:明清性灵小品[C].北京:崇文书局,2016.
- [23]陈伯海.唐诗学文献精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24]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 [25]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J].文史杂志,1944,(3-4).
- [27]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下)[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8]辛文房,著.李立朴,译.唐才子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 [29]吴文治.明诗话全编[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30]康有为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31]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乔学杰)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Disposition and Aesthetics

YUAN Ji - xi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as a Confucian classic bor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later became one of the Four Books. This classic focused on the Golden Mean which has always been explained too much.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building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aesthetics. The poetry teaching of gentleness and sincerity , as well as the ways of aesthetic training of being reasonable out of sincerity and being sincere out of reason has enlightened the personality paradigm and aesthetic standard of Chinese aesthetics.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to re - excav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aesthetics.

Fun and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LI 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 Fun contains a profound spiri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meaning of Fun has developed toward the mentality trend , which presents its aesthetic connotation. Fun is generated from disposition and nature on the appreciation of aesthetics , which manifests dense life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 unified with the object goes through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can obtain the psychic pleasure from both intuition and wisdom. The personality spirit and art works ,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mutually benefit , establish the aesthetic quality in the art. These are the deep sense of miss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loaded by Fun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 such people like Liang Qichao closely linked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Fun to life and blended morality and art , which has shaped the aesthetic realm of ideal lif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n Recent Years

ZHANG Xi - heng

(*College of Law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Shanghai 201701*)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 domestic research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ce , thought , subject , procedure , organization and guarante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nd the researches present the shift of the 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law , which is from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process analysis , from grand narratives to micro - evidence , and from " western centralism " to " the theory of local resources " . However , there are deficiencies of lacking researches on the effect assessment of the 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 the imbalance in the study of multiple mechanisms and the scarcity of 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la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Procedure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n China's Anti - monopoly Law

WANG Bo ; WANG Yu - hui

(1. *School of Law ,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 Dalian 11602*; 2. *School of Law ,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hina's anti - monopoly law is an important system established by encouraging participants in monopoly agreements to expose illegal activities and help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find monopoly agreement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requires both perfect entity rules and the full protection of rules for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procedure. Introducing the procedure of prior consultation can provide potential applicants with clear guidelines. Establishing a registered application system of prioritized reservation can facilitate applicants to appl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detect violations without delay. Improving the format of written application , clearing the or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standardizing acceptance procedures will